



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 第一辑
主编：杨镰

滇康道上

曾昭抡 / 著 段美乔 / 整理

Diankang daoshang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 第一辑
主编：杨镰

滇康道上

曾昭抡 / 著 段美乔 / 整理

Diankang daoshang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滇康道上/曾昭抡著;段美乔整理.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12
(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

ISBN 978-7-5153-1223-1

I.①滇… II.①曾…②段… III.①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现代
IV.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72459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57350511 门市部电话:(010)57350370

三河市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675×975 1/16 13.5印张 2插页 155千字

2012年12月北京第1版 2012年12月河北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定价:27.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57350337

《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

总 序

20世纪，是人类社会进展最快的世纪。20世纪的通行话语是“变革”。

就中国而言，自进入20世纪，1911年“辛亥革命”为延续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王朝的谱系画上了句号，1919年“五四”运动，新文化普及，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现代中国奠定了基础。20世纪前50年间，袁世凯“称帝”、溥仪重返紫禁城，北伐、长征、抗日战争……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受到举世关注。此后，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这些历史事件亲历者的感受，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20世纪是中国进入现代时期的关键的、不容忽视的转型期，以20世纪前半期为例，1900年，“八国联军”践踏中华文明，举国在抗议中反思；1901年，原来拒绝改良的清廷宣布执行新政；1906年，预备立宪……以世界背景而言，“十月革命”，两次“世界大战”，成立联合国……1911年到1949年，仅仅历时30多年，中国结束了封建社会，经历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到社会主义的巨大跨越。反思20世纪，政治取向曾被视为文明演进的门槛，“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不是红，就是黑，一度成为舆论导向，影响了大众思维。

无可否认，在现代社会，伴随社会的进步、发展，中华民族的民主、科学精神逐步深入人心的过程，是中国历史最具影响力的事件，

是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中国现代时期的鲜明特点。

《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则为这一影响深远的历史过程，提供了真实生动的佐证。

20世纪的丰富出版物中，一定程度上因为政治意图与具体事件脱节，人文地理著作长期以来未能受到充分关注，然而文学、历史、政治、文化、语言、民族、宗教、地理学、边疆学、地缘政治……等学科，普遍受到了人文地理读物的影响，它们是解读20世纪民主、科学思维成为社会主流意识的通用“教材”。

人文地理纪实无异于在社会急剧变革过程进行的“国情调研”，进入20世纪的里程碑。没有这部分内容，20世纪前期——现代时期，会因缺失了细节，受到误解，直接导致对今天所取得的成就认识不足。

就学科进展而言，现代文学研究是最早进入社会科学研究前沿位置的学科之一，《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则为现代文学家铺设了通向文学殿堂的台阶：论证了他们的代表性，以及他们引领时代风气的意义。

与中华文明史、中国文学史的漫长历程相比，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30多年短如一瞬间，终结封建王朝世系，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现代时期定位的标志。

“人文地理”，是以人的活动为关注对象。风光物态、环境变迁、文物古迹、地缘政治……作为文明进步的背景，构建了“人文地理”的学术负载与阅读空间。

关于这个新课题，第一步是搜集并选择作品，经过校订整理重新出版。民国年间，中国的出版业从传统的木刻、手抄，进入石印、铅

印出版流程，出版物远比目前认为的（已知的）宽泛，《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的编辑出版，为现代时期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参照，树立了传之久远的丰碑。否则，经过时间的淘汰，难免流散失传，甚至面目全非。

《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与旅游文学、乡土志书、散文笔记、家谱实录等读物的区别在于：

人文地理纪实穿越了历史发展脉络，记录出人的思维活动，人的得失成败。比如边疆，从东北到西北，没有在人文学地理纪实之中读不到的盲区。21世纪，开发西部是中国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开发西部并非始于今天，进入了现代时期便成为学术精英肩负的使命：从文化相对发达的中原前往相对落后的中西部，使中西部与政治文化中心共同享有中华民族的丰厚遗产，共同面对美好前景。通过《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我们与开拓者一路同行，走进中西部，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分担他们的艰难困苦。感受文明、传承文明。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不会因岁月流逝、天灾人祸，而零落泯灭。

《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是20世纪结束后，重返这一历史时期的高速路、立交桥。

走向边地：在20世纪40年代

段美乔

今人说起曾昭抡先生，有三个方面最为津津乐道。其一，是他不凡的家世。曾昭抡出生于湖南湘乡曾氏家族。他的曾祖父曾国潢，是曾国藩的弟弟，祖父曾纪梁和父亲曾广祚都是前清举人。他的妹妹曾昭燏和曾昭懿，一个是著名的文博学家，一个是协和大学医学博士。他的妻子俞大綱是牛津大学文学硕士，先后在南京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处任教。妻兄俞大维，以哈佛大学数理逻辑博士及德国柏林大学弹道学专家的身分受邀从政，在民国政府军政部担任要职，并自1954年起担任台湾的国防部长，时间长达10年，是我国近代国防科技发展史上重要的开拓者。妻弟俞大绂是我国著名植物病理学、微生物学家，曾任北京农业大学等校教授、校长。妻妹俞大彩是傅斯年的夫人。著名学者陈寅恪则是俞大綱的表哥。

其二，则是他名士作派。坊间关于曾昭抡先生的性情和行事颇多传闻，比如费孝通回忆说，曾昭抡一心扑在科研上，科研上的问题占满了他的注意力，走路时见不到熟人，下雨时想不到自己夹着雨伞，盛饭时分不出饭匙和煤铲，睡觉时想不到宽衣脱鞋；又比如曾昭抡曾经站在沙滩红楼前，和电线杆子谈论化学上的新发现，让过往行人不胜骇然。还有传闻说他因衣衫褴褛而被朱家骅斥出会议室，随即他便

辞去中央大学教职；他不修边幅，凌乱邋遢，以至其夫人坚决要求，只有洗过澡后才能亲近她。诸如此类的逸事让后来者给了他“风流”乃至“疯癫”的称号，尽管戴美政在《曾昭抡评传》中对一些传闻给以订正，但还是难以阻挡人们热衷于猎奇，追求名人逸闻趣事的恶趣味。

第三，则是曾昭抡先生作为著名的化学家、教育家，毕生致力科学、教育事业，为民族和国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以及对他在“文革”中惨烈经历的慨叹。曾昭抡1920年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毕业后，即赴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学，于1926年完成了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回国以后，起初他在广州兵工试验厂担任技师，不久便决心献身教育与科学事业。他先在南京中央大学化学系任教授，后又兼化工系主任，1931年转往北京大学化学系任教授兼系主任，一生从事化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为建立30年代中国新型化学科学体系做出了努力。著名的高分子化学家王葆仁，有机化学家蒋明谦，量子化学家唐敖庆等都是出自他的门下。

曾昭抡一生十分热心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工作，作为中国化学学会的主要发起人，他曾担任过4届会长，16届理事会的理事、常务理事；1933年他创办了中国化学会第一个学术刊物《中国化学会会志》。《会志》是我国第一个外文版化学学术期刊，用英文、法文、德文发表我国化学研究成果，在促进化学研究和加强中外学术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受到国际化学界普遍重视。1944年曾昭抡加入民主同盟，1946年出任联合国原子能管理委员会中国代表，在美国原子能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1948年，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

1949年以后，曾昭抡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教育部副

部长兼高教司司长，并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到了1957年，曾昭抡响应“双百”方针的号召，以民盟中央科学规划组召集人的身份与费孝通、钱伟长、千家驹等，就科学院与高等学校之间分工合作、关于科学研究的领导和保护科学家等问题提出建议，发表《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因此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67年12月8日，在反复批斗折磨中，曾昭抡因癌症离开了人世。而在此之前，他的妹妹曾昭燏在各种运动和政治清理双重挤压下，患了精神抑郁症，1964年12月22日从南京郊外灵骨塔跳下身亡。他的妻子俞大綱在被抄家和殴打侮辱之后于1966年8月24日在家中自杀身亡。

以上三者之外，作为旅行家和科考家的曾昭抡，人们似乎有些陌生。正如费孝通所言，“曾公对化学的爱好和对这门学科的贡献是熟悉他的人都清楚的，但是如果把他看成是个封锁在小天地里的专家，那就贬低了曾公的胸襟了。”^①作为他的后辈与朋友，费孝通在曾昭抡身上看到了两个主要的东西，第一个是爱国，第二个是学术。“他对化学着迷并非出于私好，而是出于关心祖国的前途。”1926年曾昭抡抛开美国宁静优渥的研究生活回到战乱中的祖国是因为爱国，1927年他放弃军工生涯转而投向教育和科研也是因为爱国，而当抗战到来的时候，“爱国”和“学术”在科学考察这一事业上发生了直接的碰撞。曾昭抡在抗战时期的科学考察活动是从1938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近300人组成师生湘、黔、滇旅行团开始的。在这次从长沙徒步走到昆明、历时68天、总计步行1300多公里的旅程中，曾昭抡以脚踏实地、实干苦干之作风，完全沿公路行走，绝不抄近路，其目的

^①费孝通，《一代学人——写在曾著〈东行日记〉重刊之际》，《读书》，1984年第4期。

是为了考察公路的路线和沿途实际情况。而每到中途休息或宿营时，只要时间允许，他总是从行李里取出防毒面具戴在头上，向当地群众讲解防毒知识。科学考察，对于曾昭抡来说，不仅是一个耙梳祖国山河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传播知识与文明的过程。

接下来，1939年7月在国民政府教育部和西康省建设厅资助下，中华自然科学社发起组建了西康科学考察团，由曾昭抡任团长，带领10余名团员，分四组赴西康省东南部作实地考察，最后各组分工写出调查报告，汇编成15万字的《中华自然科学社西康科学报告书》，由陈立夫题名，于1940年印出。而曾昭抡则在科学报告之外，撰写出详尽的考察记——《西康日记》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大为轰动。滇缅公路开通后，到缅边考察便成为许多关注国事者的愿望。1941年3月11日，曾昭抡利用寒假的机会，搭乘某机关的便车，由昆明动身，到滇区边境实地考察。虽然只有15天时间，且全是搭乘汽车，但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记，差不多每几公里都有笔记记下来”，完成了《缅边日记》一书，翔实地记录了边陲民族的风土人情和美丽壮观的自然景色。在《缅边日记》的小序里他写道，“滇缅边境，向来被认为一种神秘区域。在这边区里，人口异常稀少；汉人的足迹甚少踏进。我们平常听见关于那地方的，不过是些瘴气、放蛊，和其他有趣的，但是不忠实的故事。至于可靠的报告，实在是太缺少。”正因为此，他要通过实地考察，以“亲身的经历”破除世人的误解。

紧接着，1941年7月，由曾昭抡任团长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川康科学考察团”从昆明出发，去大凉山夷区^①进行考察。戴美政在

^①夷区、夷族、夷人为民国时期的通称。现作彝区、彝族、彝人。整理者注。

《曾昭抡评论》中说到这次考察的缘起，是因为1938年底中英庚款董事会曾致函各高校，将协助有关学校征求有志从事边省科学考察的毕业生，参加筹设的西南、西北、川康三个科学考察团进行此项工作，并决定川康科学考察团先行筹划。但因种种原因，此事一直未能实施。曾昭抡受此启发和鼓舞，于是出面组织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川康科学考察团”，计划从昆明经会理到西昌，然后再从西昌经昭觉等地徒步穿越大凉山。这是一次“半考察、半探险式的旅行”，曾昭抡希望借此“能使中国青年，对于边疆工作，发生更大的兴趣”。虽然藉着团长和团员的热情和努力，这个考察计划最终得以成行，但是却并未从该董事会得到半点资助。考察全程所需的将近国币两万元的经费，完全靠团员自行筹措负担。惟行至西昌之后，西康宁属经济建设设计委员会委托他们入夷区调查矿床资源事宜，得到有偿的贴补约六千九百元。

此次考察步行一千余公里，共用时101天。考察团成员包括了裘立群、陈泽汉、钟品仁、戴广茂、周光地、马杏垣、黎国彬、李士诤、柯化龙、康晋侯等10人，其中大多是西南联大二三四年级的学生，分别来自社会、政治、物理、化学、地质、地理、生物等不同科系。他们沿途结合所学专业进行考察，并了解沿途夷族社会、文化情形等。回到昆明后，考察团成员整理考察材料，于1942年2月印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川康科学考察团展览会特刊》，该刊收入考察团成员的文章，对大凉山夷区考察活动的沿途经历和不同感受作了记录。同年5月，考察团还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和昆明武成路举办西康科学考察展览。展出考察团所获的资料、照片和实物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根据此次考察，曾昭抡先后完成《滇康道上》和《大凉山夷区

考察记》两本专著，分别记述了川康科学考察团从昆明到西昌，从西昌经昭觉等地到大凉山的过程。

《滇康道上》一书主要记述了考察团在1941年7月1日由昆明步行出发，经禄劝、鲁车渡、会理，于22日抵达西昌的旅程。对于这次考察，曾昭抡提出最大的困难是行期仓促，未能得到各界同情与协助。经费问题是其一，科学仪器之不易得是其二。他慨叹道，虽然国家对于考察大西南是非常重视的，可惜“委托者未必尽得其人”，与他们同时出发的另一个考察团仅从重庆到西昌一路，耗费了近百万元。

虽说是“半考察、半探险式的旅行”，但过程却是非常艰苦的。他们一路行来，除会理、西昌外，均不在当时重要的交通大道上，旅途所经几乎都在西南边地中的最穷僻之地。好处是处在重要交通大道上的地区，在抗战进行当中，发展迅速。而这些偏僻区域，则较少受到抗战进程的影响，基本保持着比较原生的风貌。坏处却是交通不便、路途艰难，连基本的吃饭、睡觉也难以保障，还时时会有遭遇劫匪的忧虑。因为没有桥梁和渡船，他们曾经脱光衣服、两手高举着行李，涉水过河。为了节约时间以及旅费，他们曾经冒着瓢泼大雨赶路，结果不得不整夜睡在湿透了的棉被里。因为路况太差，他们曾经在狭窄的石子路上急行军，几天就走烂一双草鞋，也曾经在烂泥地里光着脚板走上六七里。在偏狭的小镇上，他们忍耐着鄙俗的某小学校长的污言秽语，以求得一处逼窄的房间过夜。因为走岔了路，错过餐点，不得不饿上一整天。而这其中的艰苦，曾昭抡的体会也许最深。裘立群回忆说：“旅途中，他既要照顾、教育学生，又要不停地考察记录，口袋里一直放着小笔记本和铅笔，一旦歇脚，便随时随地记

录、书写，到达宿营地后，在蜡黄如豆的油灯下，还要整理修改及补充当天的记录直至深夜，从不间断。”^①由于在旅途中要经常口头计算里程或强记景物实况，思想必须高度集中，因此，他常常口中念念有词，有时会引起别人的误解。而当团员们感觉到困难和苦闷时，他还必须用自己坚定意志和苦中作乐的奋斗精神鼓励和激发这些青年学生的信心和热情。

当然不是没有美好的留念，在金沙江边停宿时，为了躲避“马店”（专门为马提供住处的店）里的苍蝇、马粪和猪尿，他们在金沙江边度过了毕生难忘的一夜：

“那天正巧是阴历六月十四，月亮差不多是全圆。金沙江在此，由峡谷奔下，为两岸峻山所束，蜿蜒东流，其势甚猛。渡口上面一点，便有一滩；江经此处，瑟瑟作响。全部风景，殊为雄伟。隔江望南岸，对面一片暗红色，峭崖削立，高插入天；其上端与江面相距不下四百米。夜间我们在沙滩上，于黑暗中看月亮从山角后面慢慢升起来，后来天空涌出一轮明月，光辉照耀在狂流的金江上，倍增胜景。在此种极端美丽的环境下，唱唱歌，游游水，说说笑话，不觉就是半夜了。一夜看月景，览江流，听涛声，真是美不胜收。游罢仰卧沙滩上，上望天空，有时乌云托月，有时细片白云如鳞。可说是变化无穷。”

更重要的是，他们详细地记录下了川、云两省的穷僻之地社会、经济和生活的诸多细节。比如不同村镇的小学的办学详情，天主教、回教在村镇中的发展情形，传教士们的日常生活，比如不同村镇的开

^①裴立群，《曾昭抡先生带领西南联大学生考察大凉山》，《化学通报》，1999年第11期。

放程度，国民政府对边地村镇的掌控方式和程度，赶街子时外埠洋货的普及程度，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文化与生活习俗在边地乡村的交融情况，乃至1941年7月到1942年1月，昆明、西昌、雷波、宜宾等地物价程度，在其中都颇有表现。这些可谓是真的、活生生的历史。

二

曾昭抡对西南边区考察的热衷，在20世纪40年代并非特例。抗战爆发后，在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逐步由东部向西部转移，与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逐步转移相应而来的，是高等学校、文化机构、学术团体、出版单位向西部的迁移，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规模的人员迁移。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关西南旅行记的写作形成一个热潮。

依据《民国时期总书目》，并参考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和《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中华书局图书总目1912~1949》可知，民国时期出版游记类图书近600种，涉及西南地区的近70种，其中抗战及抗战胜利后出版的近50种。又如，以《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为例，在1937-1948年间，就有超过25部的西南旅行记问世。对比书中1919年-1936年的目录，西南旅行记不足5部。编撰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虽有不少的遗漏，但这样的平行比较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明问题。又如以中国旅行社主办的《旅行杂志》为例，1938年底杂志编辑曾经作了一个统计，从1927年杂志创刊到1938年底的12年间，该杂志共发表了1500余篇游记，其中云南约9篇，贵州仅有4篇。而抗战爆发后，有关西南大后方的文章开始大量出现在该杂志上，大受读者欢迎。1938年11月和

1940年4月《旅行杂志》特意出版了两期专号：《西南专号》和《四川专号》。而后中国旅行社还将选编部分刊登在杂志上的介绍西南大后方的文章，出版了《川康游踪》一书，很快便告售罄。

与此前的西南旅行记相比，抗战时期的西南旅行记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首先，纯粹的描摹山水的旅行记在这一时期逐渐退居次席，以流亡记、旅寓记、考察记、复员记等形态出现的旅行记开始占据主体，而其中又以带有考察性质的旅行记在数量上和影响面上最为突出。由于战争的需要，开发西部成为朝野上下的呼声和行动。大批的公务人员、专家学者、学生等深入西南、西北内地执行公务、观览胜景、采访民风、考察资源，展开多方面的调查研究，僻远的云贵山区、川西、西康及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出于了解大西南、建设大西南的需要，国民政府、地方军阀以及众多社会力量，如报刊媒体、研究机构等开展了多种对西南边疆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的考察活动。这些考察活动结束后，考察者往往在正式提交的报告之外，大多会创作一部旅行记，用生动的笔致记录一路的所见所闻。这些旅行记的写作者往往具有双重身份，他们大多并非专门作家，他们不是为了文学创作而深入生活，而是因为工作原因而在崇山峻岭中辗转，文学创作只是工作之余的副产品。

西南旅行记的写作在抗战时期得以形成热潮，是有其必然原因的。首先，抗战爆发后，作为后方重地的西南地区，有着复杂的地形和丰富的资源，既是战争的避难所，也是复兴中国的一块宝地。而了解大西南、稳定大西南、建设大西南成为攸关民族危亡的大事。可以说，这已经成为中国各阶层人们的一项共识。

国民政府对于西南地区的重视是不言而喻的。1937年11月19

日，蒋介石在南京国防最高会议上作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演讲，明确提出把西南尤其是四川“作为真正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①这一理念在政务实践中也有明确的表现。例如，1938年6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就曾发密咨，要求了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状况：“查西南各省边区，汉夷杂处，自古多事。明清以来苗变层见迭出，考厥原因实由于当时政府忽略宣导，边官措施失当，坐令民族间之情感隔膜，有以致之。值此全面抗战期间，所有地方秩序之稳定，民力之团结，在在俱关重要。”^②又如，1943年9月，云南省民政厅给内政部的呈文说道：西南边疆区域“举凡山川气候、住民生活，均不同于内地，而物产丰饶，蕴蓄富厚，则又远非内地所能及，未能开发利用，小之足以影响本省政治经济文化之向上发展，大之足以妨碍国家民族团结统一。……为促进边疆之开发，裨得早与内地均齐发展，暨巩固国防起见，因根据需要，于厅内成立‘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网罗专门人才根据边地实况，拟定具体方案，作为推行边地行政之张本。并培养边疆工作干部，以供政府开疆殖边之助。”^③

与此同时，不少学术团体、研究机构和出版机构都把大西南作为新的考察目标。例如1938年中国民族学会创办《西南边疆》杂志，其宗旨便在于“以学术研究的立场，把西南边疆的一切介绍于国人，

①《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第652页，台湾中央文物社，1984年。

②《云南省政府密一民字第174号密令》（抄件），1938年6月16日，云南省档案馆藏：民政厅全宗第9卷。

③《云南省民政厅呈报成立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抄件），1943年9月27日，云南省档案馆藏：省政府秘书处全宗646卷。

期于抗战建国政策的推行上有所贡献。”^①1941年中国边政学会边政公论社在四川巴县出版了杂志《边政公论》，以研究边疆政治及其文化，介绍边疆实际情况为目的，举凡政治、经济、交通、教育、宗教、民族、语言、史地诸问题有关于边疆之一切论著，都予以发表。又如1942年夏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正式成立，并着手印行学术刊物《边疆人文》，而云南大学则专门成立了“西南文化研究室”，并在1943到1949年间出版了《西南研究丛书》约10余种，内容涉及西南地区经济地理、区域文化史、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等多个领域。此外还有1946年昆明的新云南丛书社出版了《新云南丛书》等等，集中展现大西南的文化和生活现状。可以说，作为整体性的区域文化，大西南成为多学科、多领域关注的焦点。

作为个体的中国民众同样迫切地想要了解祖国的大好河山。学术研究者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中华民族建构的迫切现实催生了流行一时的“文化抗战”和“文化建国”的观点，促使学者们不断地思考着学者在战争期间应该去做什么、做学术的目的是什么。正如语言学家邢公畹在《壶水曲》中所说的：“国难之际，中国知识分子愿意‘捐弃了他们的所有’，空万念、轻生死，试把自己的生命安排打点，怎样能化成一股力量，铸成祖国的将来、和全人类的将来。”^②薛建吾在《湘川道上》的“自序”中说道：这样的旅行记“一则供政治家之参考，再则印个人之鸿爪，三则记流亡之实况，四则志抗建之真相。”^③这个概括颇具代表性，我们在许多学者的西南旅行记中都可

①《西南边疆》第1期，1938年。

②邢公畹又名邢楚均，《壶水曲》，《文学杂志》第2卷第10期。

③薛建吾，《湘川道上》，“自序”，商务印书馆，1942年5月。